



1949—1979

贵州三十年文艺评论选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三十年文艺评论选

本社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164千字 2插页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贵阳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书号 10115·390 定价 0.58 元

前 言

147/50

建国三十年来，我省文学艺术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文艺评论工作尽管是个薄弱环节，但在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为推动我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在国庆三十周年之际，我们选编了这本《贵州三十年文艺评论选》。

在这本评论选里，共选了二十三篇文章，大都是发表在我省报刊杂志上的。我们力求通过这本评论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省三十年文艺评论的概貌，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文艺创作取得的成果。由于这些文章都是过去发表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有些文章在个别提法上不能不作改动。这次编选中，在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作了个别提法和文字上的修改，这是需要向广大读者说明的。

我们编选这样的集子还是第一次，加上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作者批评、指正。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山花》《贵州日报》等编辑部以及广大评论工作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特在这里致谢。

编 者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录

粉碎“三突出”的理论体系·····	岳 文 (1)
形象思维与议论·····	蒋孔阳 (10)
从拉萨尔的历史剧谈起·····	李印堂 (18)
贵州农村如花似锦·····	冯健男 (26)
试谈《挡不住的洪流》的思想内容及其它·····	齐 放 (35)
永远忠于革命·····	丁 鉴 (44)
漫谈几位新人的新作·····	蹇先艾 (49)
试谈胡学文的创作·····	柏 森 (57)
谈《活愚公》·····	古 淮 (67)
喜读长篇小说《英雄的乡土》·····	王 梧 (73)
论《窦娥冤》·····	林钟美 (79)
试评黔剧《奢香夫人》·····	何 平 (97)
漫谈黔剧《秦娘美》·····	邢立斌 (104)
戏剧的语言与性格·····	纪 芒 (117)
农村生活的诗情画意·····	杜 郁 (135)
将军本色是诗人·····	叶润桐 (147)
新中国预言诗人的歌唱·····	钱理群、秦家伦 (154)
笔补造化天无功·····	马焯荣 (166)

巢经巢诗说·····	李独清 (176)
谈生活的感受·····	思 基 (219)
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	全 陵 (229)
关于肖像描写·····	建 安 (233)
文贵在新·····	柳 枏 (238)

粉碎“三突出”的理论体系

岳 文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人帮’长期控制舆论阵地，大量散布修正主义谬论，任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篡改和歪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许多正确的东西被他们说成错误的，许多错误的东西被他们说成正确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确实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在文艺阵地上，“四人帮”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起先，大野心家江青提出所谓“根本命题”的理论。其后，他们“总结”出一套实现“江记理论”的方法，即所谓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去年，他们又提出了所谓写“同走资派斗争的作品”，鼓吹要大力塑造同走资派斗争的“英雄典型”，从而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体系。按照“四人帮”的这一理论，文学艺术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文艺创作的最高原则就是突出一个“一号”英雄人物。在“四人帮”控制文艺界的岁月，他们这个以“三突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成了文艺工作必须遵循的方向，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文艺批评必须依据的唯一标准，谁要是敢越雷池半步，谁就要遭到灭顶之灾！

“四人帮”这套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流毒极深，危害极大。现在是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无产阶级文艺的服务对象和使命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同“四人帮”存在着原则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服务对象和使命是不是由无产阶级文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规定的？

文艺是上层建筑之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上层建筑并不以自身的建立和发展为目的，归根结蒂，它是为巩固和发展产生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毛泽东同志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说：“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作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之一的无产阶级文艺，作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无产阶级文艺，它的历史使命，就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从而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

“四人帮”不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常识，把问题完全颠倒了过来，别树一帜，把创作中塑造英雄人物这样一个属于完成文艺历史使命的艺术手段和描写内容，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问题。这样，这个以“三突出”为中心的理论，就使文艺的阶级属性，文艺反映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替政治经济服务的作用不见了，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修正掉了。实际上否定了毛主席确定的文

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二

无产阶级文艺要不要塑造英雄人物典型？

答案是肯定的。批判“三突出”的理论体系，目的并不是否认无产阶级文艺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相反地，为了使无产阶级文艺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作为一项重大的创作课题，大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尽管如此，无产阶级文艺仍然不是把塑造英雄人物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又说：文艺应当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既给我们指出了文艺创作必须典型化（包括典型人物的创造），同时又指出了典型化的目的是“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可见塑造英雄典型人物，乃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是为了完成文艺的使命，而不是为了塑造英雄典型人物的本身。

“四人帮”的吹鼓手们，为了使他们“旗手”的“理论”站得住脚，公然宣称：古往今来，各个阶级都把塑造本阶级的理想人物作为文艺的根本目的。错了，这完全是不顾历史

事实的胡说白道！恰恰相反，古往今来各个阶级都是把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治统治，或者动摇和破坏敌对阶级的政治统治，作为本阶级文艺的最高使命，而把塑造本阶级的理想人物作为达到其目的的一种艺术手段而已。

三

“四人帮”果真是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人物吗？

回答是否定的。他们所谓的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是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大家知道，电影《创业》不就塑造了周挺杉、华程这样一些为广大群众公认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吗？然而“四人帮”却横加指责，恨之入骨。为了扼杀这部影片，他们竟给捏造了十条之多的莫须有罪名。类似的例子不可胜数。

“四人帮”真正要的是什么样的英雄典型呢？那就是去年他们声嘶力竭叫嚷的“同走资派斗争”的“英雄人物”。他们所谓的“走资派”，就是他们臆造的占老干部百分之七八十的所谓“民主派”。“四人帮”在文化部的那个亲信狂叫说，对这部分人，不仅要写下边的，而且还要写中央的。很显然，他们狂叫要与之斗争的所谓“走资派”，甚至包括了象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这样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他们所谓的与“走资派”斗争的“英雄”，原来就是按照他们的反动政治理想，能为他们篡党夺权充当走卒和打手的“英雄”，也就是适应“四人帮”反革命需要的反党反革命的急先锋。

问题还不止此。“四人帮”的“三突出”的理论体系，

还包涵一个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通过塑造所谓的“英雄人物”，大树他们一帮，为他们实现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迷梦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不是口口声声叫嚷，要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这个主要英雄人物必须是“要坐第一把交椅”的“一号人物”吗？甚至连“一号人物”最好是女性也作了要求。说穿了，这不就是为白骨精江青梦寐以求的要当女皇帝鸣锣开道吗？“四人帮”在天津的一个亲信插手搞了一个剧本《红松堡》。这个剧本改来改去，“一号人物”总是不如他们的意，通不过。后来把江青的一些“精彩”的语言给了剧中的“一号人物”，这个剧本一下子就通过了。“四人帮”所谓的塑造英雄典型的反动实质和要达到的反动目的不是昭然若揭吗？

四

谁是历史的主宰？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文艺作品必须塑造英雄人物。但是，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能是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救世主”，而应该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又能“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率领群众一道“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孺子牛”。无产阶级文艺要塑造这样的英雄人物，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

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进行文艺创作，包括塑造英雄人物的唯一正确途径。

可是，“四人帮”却反此马克思主义创作之道而行之。他们从不提倡深入生活。而是拚命鼓吹完成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那一套“三突出”方法，并把它上升到“创作原则”，作为“文艺宪法”加以推行。他们的这种所谓“三突出”，一句话：其他人物都是陪衬；一切为了“一号人物”，一切决定于“一号人物”。这个人物在“风口浪尖”上大显身手，只要他（她）一出现，天大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否则，群众在任何困难面前都只能束手无策。不根据实际生活，按“三突出”规定的公式套出来的作品，其中出现的人民群众，都只不过是一些浑浑噩噩的“群氓”，一些用来陪衬英雄人物的“木偶”。请看，“四人帮”一伙就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把人民群众贬低、丑化、歪曲到了何等的地步！

“四人帮”曾不打自招地供认，这样做是为了“如众星之拱明月，绿叶之扶红花。”好家伙！原来群众只不过是“四人帮”眼中的“英雄”们的一块垫脚石而已。历史并不是人民创造的，一切奇迹都出自“英雄”。这是对历史的完全颠倒，是典型的英雄史观。

五

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何在？

“四人帮”控制文艺阵地的这些年来，好些反映我国各个革命时期革命斗争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表现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总是遭

到“四人帮”的责难和扼杀；一些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品种，几乎濒于绝灭的境地；某些被“四人帮”钦定的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东西充斥文坛。这种反常现象的根源，盖出于“四人帮”的那套谬论。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并为我们提出了鉴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对毛泽东同志为我国规定的这一条发展、繁荣无产阶级文艺的方针，“四人帮”恨得要死，他们粗暴地践踏它，妄图用“三突出”为中心的谬论来取代它。他们甚至露骨地叫嚷：六条政治标准是“最低要求”，言下之意，他们那个“三突出”论则是最高准则了，其反动气焰是何等嚣张！在他们那套“理论”的控制之下，文艺作品不能塑造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不能塑造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人物，几千年来农民起义的历史题材不能写；只能按照他们规定的“创作中心”以及“三突出”、“高起点”等模式，从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出发，凭借作者个人“天马行空”地去编造所谓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这样的作品怎能不是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东西，它根本不可能反映出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根本塑造不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叱咤风云的、有血有肉的工农兵英雄典型，更说不上去深刻揭示英雄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了。他们的“英雄”，要么就是张铁生、翁森鹤一类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要么就是反动影片《反击》中以江青及其在北京的一个死党作化身的赵昕、江涛，《盛

大的节日》中以张春桥、王洪文作化身的井峰、铁根这些家伙；要么就是说大话，发豪言，没有血肉，内心空虚，“坐下象雕像，站起象尊神”的“超人”。象《雷锋》中的雷锋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竟然被他们斥之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线”的人物而被否定掉。照此办理，怪不得有那么多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皆因不符合“四人帮”的“三突出”论所规定的模式而被否定了。在“四人帮”那套文艺谬论屠刀下，哪里还谈得上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错综复杂，哪里还谈得上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哪里还谈得上文艺创造性，又怎么能够去完成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以促进历史的发展呢！

综上所述，“四人帮”把塑造英雄典型形象当成文艺的根本任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它妄图以文艺创作的艺术手段和描写内容取代文艺的作用和目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它篡改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早已阐明了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和基本任务，取消了无产阶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妄图使无产阶级文艺蜕变为“四人帮”的帮文艺；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它是砍杀社会主义文艺的屠刀，是扼杀文艺创造性的绞索，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根源。一句话：以“三突出”为中心的那套谬论的根本，就在于它是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服务的。

其实，“四人帮”的这套货色，并非什么新鲜玩意，它只不过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唯心史观为哲学基础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大杂烩。它根本上背叛了无

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搅乱了文艺思想，弄乱了文艺理论，使形而上学在文艺界猖獗，让唯心主义在文艺界横行。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被他们弄乱了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必须在深入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加以澄清，被他们弄颠倒了的東西必须在批判和斗争中重新颠倒过来。

我们一定要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把同“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界的一切流毒，永远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园地中，春光明媚，繁花似锦的图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举起双臂去迎接它吧！

载《贵州文艺》一九七七年第二期

形象思维与议论

蒋 孔 阳

法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说：“发议论——是人的特点和他的精神上的快乐。不发议论的作家——只是个手艺人。”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真正的作家是要发议论的。事实上，一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无不或多或少地以不同的方式发议论。而议论，我们都知道，是带有较强的理论性的，更符合逻辑思维的特点。那么，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发议论，会不会破坏文学艺术形象性的特点，并把形象思维的特殊方式转入到以分析、推论、判断等为主的逻辑思维的方式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具体分析。首先，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思维，都是客观现实及其规律性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不过反映的方式不同而已。逻辑思维固然对现实生活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形象思维又何尝不对现实生活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呢？这种分析、判断和评价，就构成了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思想部分。愈是伟大的作家，愈是对生活具有深刻的理解，从而使他们的作品愈是闪耀着思想的光辉。这些思想既然是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判断和评价，因此，它们即使不具备逻辑思维那种推理的理论形式，但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认为任何有价

值的艺术作品，都可以说是用艺术形象的形式，来对现实生活所发表的议论。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认为形象思维的本身就包含有议论的成分。那种认为形象思维不能发议论的讲法，是站不住脚的。其次，形象思维所发的议论，当然必须符合形象思维的特点。那就是说，它不是直接讲出来的，而是通过形象的描写，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就象血液流在血管中一样，形象思维的议论是溶解在作品所描写的具体的形象中的。然而，除了这种与形象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议论之外，有时作者离开了形象的描写，直接以逻辑思维推理的方式，来发表他那雄辩而又有力的议论，也是有的。对于这样的议论，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呢？我们说，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都不是思维的目的，而都只是思维的不同方式和工具。作者为了塑造形象，为了遵循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他固然主要地应当用形象思维来进行创作和构思，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之下，他认为逻辑思维更有利于他塑造形象，更有利于他通过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那么，他偶然运用一点逻辑思维的方式，也是应当允许的。哲学家、科学家在写理论文章的时候，不也有时浮想联翩，用形象思维想象的方式，来描写展现在他面前的生活景象吗？因此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并不是绝对相互排斥的，只要不违反文学艺术总的形象思维的特点，偶然通过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发一点议论，也是未始绝对不可以的。事实上，象雨果、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这样一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某些著作中就常常感到形象的描写还不足以充分表达他们的思想，于是直接以理论的形式发表了一些议论。这些议论，并没有妨害他们的作品的伟大。

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再来具体地分析一下形象思维与议论的关系。一般说来，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议论有两种：一是人物的议论，一是作家本人的议论。人物生活在作家所描写的生活当中，与他周围的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遭遇各种各样的命运。对于这一些关系和命运，他不能不有一定的看法，不能不表示一定的态度。这些看法和态度，一方面揭示了人物性格中思想和感情的深度和广度，另方面也就构成了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的议论部分。毫无疑问，这种人物的议论是服从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描写的。离开了人物性格和形象的要求，这种议论就显得干枯和没有生命了。因此，人物的议论，应当是充分地性格化的，形象化的，符合形象思维的特殊规律的。例如《红楼梦》里面，贾宝玉骂“国贼”、“禄蠹”，骂“文死谏，武死战”，并常常叹息自己要化成“飞灰”和“轻烟”，所有这些议论，都是直接从贾宝玉的性格中流露出来的。人物的性格不同，他们议论的内容和方式，也就迥然不同。林黛玉和薛宝钗，决不会发同样的议论，更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议论。作品中大量的人物的议论，都应当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类型的。它们是人物思想和感情的形象的体现，是人物性格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作家不仅是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来构思它们，而且也是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来表现它们。《三国演义》中曹操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他的这一想法和讲法，就集中地暴露了这个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的奸雄的性格和为人。作者不是单纯为了这一议论而加以描写，而是为了充分揭示曹操性格的本质特征，然后以画龙点睛的生花之笔，加以描写出来的。至于有些作品中人物的长篇大论，如象哈姆雷特